

春秋五霸之异说及其流传

朱浩毅

(佛光大学 历史学系,台湾 宜兰 27262)

摘要:在历史流传影响下,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历来已被认知为春秋五霸之基本元素成员。然而,古代学者在讨论此一问题时,亦有不少另持别种主张,如增或删而入晋悼、楚灵、吴阖闾、夫差、越句践等,遂致五霸异说呈现多元化。当春秋五霸一词析为“春秋”与“五霸”两词时,“春秋”可以是文本的《春秋》,也可以是历史的春秋,既可以与《孟子》贬霸之词对话,也可以因相对性而与三代王者对话。在历史流传中,春秋五霸产生诸多异说,春秋五霸组合亦有诸种多样组合;然而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所组成的春秋五霸依旧广为流传,文化的承传不可说毫无影响力。

关键词:春秋;五霸;二霸;二伯;《孟子》

中图分类号:K2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5)02-0009-12

在国内中小学教育体系中,春秋五霸一直是以专有名词之形式在教授,并且明确地指出春秋五霸为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再附带说明春秋五霸之丰功伟业——“尊王攘夷”。但有趣的是,如将这既定的概念带到中国传统经典里,尤其是以同是呈现春秋为内容的《春秋》,以至于《三传》,便找不出共鸣,更别说“尊王攘夷”。如再检阅先秦诸子,歧异则更大,如《墨子》、《荀子》所论述的春秋五霸,即非今所知之定解^①。于是,不免怀疑所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之合法性。也就是说,春秋五霸为一模糊名词。

事实上,对于春秋五霸不稳定性的问题,两汉以来之诸贤早已注意,甚至加以辩解。如班固奉旨所编《白虎通》就明显记载着春秋五霸之两种异说,这显示在当时至少有两种异说存在^②。又如何休与郑玄对春秋五霸作个别的分析,从而认定是否真为霸者。也就因为春秋五霸是可以讨论的,因此部分前贤在探讨春秋五霸异说之余,出现了自我再定义的现象,

如全祖望就有“齐一而晋四也”的论调。当然,亦出现了实非“五霸”的说法,如孔颖达的“其数无定限也”。然而,不论这些论点本身是站在哪一种立场以成说,所要面对的挑战多半是针对于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这一说法的怀疑。换句话说,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所组成的春秋五霸在不稳定之情况下依旧流传。

既然春秋五霸历来已有异说存在,且直至今日依旧持续讨论^[1-24],为何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所代表的春秋五霸会成为通说,这实属值得关注与讨论之问题。

又“霸”与“伯”二字历来多互用,陆德明《经典释文》即载:“伯音霸又如字本又作霸”、“二伯如字

① 《墨子》与《荀子》所提出的春秋五霸皆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虽然《墨子》一书据张心澄《伪书通考》考证认为可能是战国末年以后所出,但本文在此之所以引用,无非是想说明春秋五霸之歧异性。

② 《白虎通》所记载的五霸异说实有3种,分别为“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与“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但因第一说所列举之5人并非全然是春秋时期的人物,故不计入。

又音霸”^[25]。此外，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时亦言：“霸”，“俗用为王霸字，实伯之假借字也。”^[26]也就是说，“五霸”与“五伯”在流传的过程中已混淆其界，不能别其义^①。换言之，在讨论春秋五霸之时，不能忽略春秋五伯一词。

一、众家对春秋五霸的诠释

虽然《墨子》已有春秋五霸之雏型，但由于《墨子》的书写年代尚有争论，故今所能见及的资料中最早提出“五霸”^[27]一词的当为《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28]又说：“五霸桓公为盛。”^[28]，由于孟子并无继续明言交代其余四霸为何人^②，因此后人在讨论孟子所提之“五霸”时，即由此产生异说。

如从孟子提出“五霸”之词来推敲其义，孟子应当认定春秋有五霸，但由于孟子本人语焉未详，故本文对于孟子之意见并不多加讨论，而着重于后世之注家。有趣的是，此情况同样发生在尸子身上，《尸子》载：“汤复于汤丘，文王幽于羑里，武王羈于玉门，越王栖于会稽，齐穆公败于穀塞，齐桓公遇贼，晋文公出走，故三王资于辱，而五伯得于困也。”^[29]此文虽明言五伯，但只交代齐桓、晋文、秦穆、越句践4人，依然有“缺一”之憾，而无从认定其说。

如以《史记》为例，可发现“五霸”与“五伯”之词虽时常被司马迁所引用，但要明确交代司马迁所言之春秋五霸究竟为何，亦属困难。从以下所引文字至少可知，司马迁的五霸与今所谓的春秋五霸当是有所差异。“昔者越王句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30]

由于此类提及五霸（或五伯）而未详加说明的情形在前贤著作中时时可见，因此以下仅就有确切说明其看法者来论述。

（一）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为春秋五霸

《荀子·王霸》载：“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覩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覩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感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

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鸷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僻陋之国也，感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31]从这段文字可知，荀子所认定之春秋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5人。荀子也于《议兵》篇中继续发挥此论点：“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是皆和齐之兵，可谓入其域矣，然而未有本统也，故可以霸而不可以王。”^[31]

《墨子·所染》亦有相同观点：“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楚庄染于孙叔、沈尹，吴阖闾染于伍员、文义，越句践染于范蠡、大夫种。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32]

虽然《墨子》经过张心澄的辨伪，认为是战国末年以后才书写而成，但其记载之春秋五霸与《荀子》的说法雷同就值得玩味，更重要的是《墨子》此段文字亦同样出现于《吕氏春秋·当染》中。这是否意味着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乃战国末年的春秋五霸之通说呢？因此近人致中就认为此乃春秋五霸之古训^[1]，而张有智以为此为春秋五霸之确解，国内中小学课本也应据此修改^[7]。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有两本以春秋五霸为书名的通识书籍或历史故事书，所选择的“五霸”就是采用此说。一本是郑会欣的《春秋五霸》^[33]③，另一本则是晁福林的《乱世称雄——春秋五霸》^[34]④。相较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的通识书籍多以齐桓、晋文、宋襄、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的普遍认知时，如林汉达的《春秋五霸》^[35]、张景贤的《春秋五霸》^[36]，此种转变实值得注意。

① 事实上，“五霸”与“五伯”乃两个不同概念，也就是说，“五霸”并非“五伯”。然而历来学者多未加慎察，而将两者互用通假，从而模糊其各自之本意。今讨论“五霸”之时，必先暂时沿袭前人之“误解”，才能再从中个别分述。

② 或以为《孟子·梁惠王上》将齐桓公、晋文公并提，以及《孟子·告子下》言及秦穆公用百里奚而霸，从而将晋文公、齐穆公算入《孟子》所言之“五霸”中。但不管如何，依然无法确知《孟子》所指五霸为哪5人。

③ 该书的《序言》曾提及，之所以选择这5位“霸者”，乃是依据《左传》而来，然而检阅《左传》的经、传、注、疏，却找不出此说法之根源。

④ 其实晁福林出版此书的9年前曾发表过一篇《论春秋霸主》，载《史学月刊》，1991年第5期，12-18页，第二年又分别以繁体字和简体字出版《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繁体字版为台北锦绣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简体字版为三联书店1992年版）。从《论春秋霸主》以及《霸权迭兴：春秋霸主论》可知，晁福林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5人为春秋五霸的概念从未改变，却又认为春秋历史的发展，除了春秋五霸之外，尚有其它强者，故论春秋霸主而非春秋五霸。从早年以春秋霸主的角度书写到现在回归春秋五霸，晁福林的改变除非是出版策略考虑，否则应当注意。

(二) 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为春秋五霸

西汉王褒在其《四子讲德论》中曾有以下的言论：“三代以上，皆有师傅；五伯以下，各取其友。齐桓有管鲍湿宁，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晋文有舅犯赵衰，取威定霸，以尊天子；秦穆有王由五羖，攘却西戎，始开帝绪；楚庄有叔孙子反，兼定江淮，威震诸夏；勾践有种蠡渫庸，克灭强吴，雪会稽之耻；魏文有段干田翟，秦人寝兵，折冲万里；燕昭有郭隗乐毅，夷破强齐，困闷于莒；夫以诸侯之细，功名犹尚若此，而况帝王选于四海，羽翼百姓哉！”^[37]这段文字共出现了7位君王，其中魏文、燕昭已进入战国时代外，其余的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皆处于春秋时代。因此王褒并没有清楚地交代这5个人是否就是其所谓的五霸，而今就姑且依其所举，认定这5人乃其所认知之“五霸”^①。

而实际将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5人称为春秋五霸的是清初的顾炎武。虽然顾炎武立说之理由全然与韩非子、王褒不同，但结果是相同的。其《日知录》“五伯”条曰：“‘五伯’之称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有春秋之‘五伯’。《左传》成公二年，齐国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元凯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孟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赵台卿注：‘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二说不同。……若《孟子》所称‘五伯’，而以桓公为盛，则只就东周以后而言。……然赵氏以宋襄并列，亦未为允。宋襄求霸不成，伤于泓以卒，未尝霸也。《史记》言越王句践‘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伯。’……然则言三代之‘五伯’，当如杜氏之说；言春秋之‘五伯’，当列句践而去宋襄”^[38]。

从上文可知，顾炎武所认定的春秋五霸正是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然而顾炎武只是全然一味地相信春秋确有五霸，并单纯地以实力衡量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所形成的通说，从而以削去宋襄与填入越句践之方式得出结论。无怪，马先醒于《春秋五霸与秦穆五贤》一文中调侃地说：“即使严夷夏之分者如顾炎武，竟亦不例外。”^[39]

(三) 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为春秋五霸

《白虎通·号》载：“五霸者，何谓也？……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40]此种组合看似第一次提出，但其所列举

的5人就各自“成就”来说，并非无中生有，因此《白虎通》不过是将以往的组合（前二说）再做一新诠释。不同的是，《白虎通》认定此5人之标准，乃在于引经据典地认为“圣人与之”^[40]：“《论语》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于是知晋文之霸也。《尚书》曰：‘邦知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楚胜郑，而不告从，而攻之，又令还师，而佚晋寇。围宋，宋因而与之平，引师而去。知楚庄之霸也。蔡侯无罪，而拘于楚，吴有忧中国心，兴师伐楚，诸侯莫敢不至。知吴之霸也”^[40]。

(四) 以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为春秋五霸

此外，《白虎通》对于春秋五霸尚有一说：“或曰：‘五霸，谓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宋襄伐齐，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春秋传》曰：‘虽文王之战不是过。’知其霸也。”^[40]

此尊宋襄的说法，正出于《公羊传》鲁僖公二十二年之传文^②，然而为何此说在尊宋襄之余，却选择黜吴阖闾，《白虎通》未加说明。如从应劭《风俗通义·皇霸》言“《春秋说》：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五伯也”来推敲^[41]，当是当时流行的《春秋》传说。果真如此，黜吴阖闾的原因之一可能亦与《春秋》有关，毕竟进宋襄公之理由与《公羊传》同。而考之《公羊传》，虽赞赏吴阖闾“有忧中国之心”，但吴阖

① 事实上，王褒将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视为“五霸”（尤其是越句践），并非没有依据。《韩非子》早就隐约地提及这5人之霸业。虽然《韩非子》并未详细交代“春秋五霸”所指为何，但如仔细地从各章的句子中搜寻，实可发现其亦有“霸者”之观念，当然也就有所指。如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十五卷《难二》记载：“夫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美之大者也，非专君之力也，又非专臣之力也。……蹇叔处于干而亡，处秦而秦霸，非蹇叔愚于干而智于秦也，此有君与无臣也。……昔者桓公宫中二市，妇间二百，被发而御妇人，得管仲为五伯长。……昔者晋文公慕于齐女而亡归，咎犯极谏，故使反晋国。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以舅犯霸。……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于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第十六卷《难四》也云：“大诛报小罪也者，狱之至也。……是以晋厉公灭三却而栾中行作难，郑子都杀伯杼而火鼎起祸，吴王诛子胥而越句践成霸。……非贤而贤用之，与爱而用之同。贤减贤而举之，与用所爱异状。故楚庄举叔孙而霸，商辛用费仲而灭，此皆用所贤而事相反也。”从这两段引文数之，正好为“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5人。可惜由于不知这5人是否即为韩非子所认定之全部的“霸者”，故姑且放此，聊备一说。除此之外，《尸子》的春秋五霸虽只提到四霸，但从其论述此四霸的理由可发现，与王褒《四子讲德论》内容雷同，因此可推敲认定此说亦为当时所流传。

② 《公羊传》鲁僖公二十二年载：“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偏战者日尔，此其言朔何？春秋辞繁而不杀者，正也。何正尔？宋公与楚人期战于泓之阳，楚人济泓而来，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厄人，吾虽丧国之余，寡人不忍行也。’既济未毕陈。有司复曰：‘请迨其未毕陈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见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艺文印书馆1997年版，卷十一《僖公十四年》。

闻败楚之后，其行径依旧为“夷狄”，故《公羊传》最后还是于鲁定公四年“庚辰，吴入楚”此条经文中黜之，曰：“吴何以不称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盖妻楚王之母也。”^[42]这种说法亦见于《穀梁传》^[43]①。

不过《白虎通》此说一出，遂成为通说，影响至今。如赵岐注《孟子·告子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一句时，就言：“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28]又如高诱注《吕氏春秋·当务》“备说非六王五伯”^②以及注《淮南子·泛论》“五伯有暴乱之谋”^③二句的“五伯”时，皆言齐桓、晋文、宋襄、楚庄、秦穆^④。再如《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政由五伯”一句，司马贞《史记索隐》即云：“五霸者，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也。”此外，颜师古注《汉书·地理志》“至春秋时，尚有数十国，五伯迭兴，总其盟会”一句时，也是采此说：“师古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⑤

即便在今日亦有学者在探讨春秋五霸之各种组合后，依然认同此说。如吕思勉《先秦史》就依通行之说立“五霸事迹上、下”二节论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⑥。又如姚秀彦于《五霸考述》中认为“本来霸不必五”，但在分析后发现仍然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较为适合，且较符合“发扬周的仪文礼让，传递大一统思想，启迪后代处理国际事务之原则和法式”等条件^⑦。再如周国荣、沈容在《“五霸”还是“五伯”》中认为春秋五霸一词只会产生出把持王政的“霸”，此非春秋五霸本意，故应以春秋五伯解释才对，认为“伯”乃“长也”“老大哥”的意思，只有讲“仁义礼信”之人才可为，于是符合条件者只剩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5人^[9]。

（五）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为春秋五霸

此看法乃颜师古注《汉书·诸侯王表》“盛则周、邵相其治，致刑错；衰则五伯扶其弱，与共守”一句时所说：“师古曰：‘伯读曰霸。此五霸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也。’”值得注意的是，颜师古本身对于春秋五霸即产生异说^⑧。不过从颜师古说五霸推敲，颜师古应是知道此说与上说不同。然而为何出现异说，应是颜师古随着《汉书》文意之不同而自有变通有关，其在《汉书叙例》即言：“今则各依本文，敷畅厥指，非不考练，理固宜然。亦犹康成注《礼》与其书《易》相偕；元凯解《传》，无系毛、郑

《诗》文。”也就是齐召南所解释的：“此文专言周衰故注异解，其不数楚庄而数吴夫差者，楚僭王未有扶弱之事，吴夫差黄池之会尝共贡职于周也。”^⑨只不过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为春秋五霸之说从何而来，实无前例^⑩。

（六）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夫差为春秋五霸

此乃南宋黄仲元的见解，他认为论春秋五霸当以《史记》为证。因《史记》“自东迁以前，皆纪周事；东迁以后，杂记诸侯，凡齐桓、晋文、秦穆、楚庄，一一俱载”^⑪，反之宋襄公却非，故宋襄公不列春秋五霸明矣。又因《史记·吴太伯世家》曾记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一事，因此黄仲元特将吴夫差附之曰：“五霸合以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夫差为五。”^⑫

或许此春秋五霸之组合过于新颖，黄仲元除先以《史记》立说外，又以《汉书》为证，其自注曰：“汉史注五伯有三：《表》‘适戍强于五伯’，师古曰：‘伯读曰霸，五伯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诸侯王表》‘衰则五伯扶其弱’，师古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地理志》‘春秋时五

① 《穀梁传》鲁定公四年载：“何以谓之吴也？狄之也。何谓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寝，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盖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败人之绩而深为利。居人之国，故反其狄道也。”

② 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卷第十一《仲冬纪第十一·当务》。

③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十三《泛论训》。

④ 秦穆公书写成秦穆公，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秦穆公，缪音木，故史或称秦穆公；一为秦穆公为庙号，秦穆公为谥号。

⑤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97年版，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

⑥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九章第三、四节分别为“五霸事迹上”与“五霸事迹下”。虽然吕思勉依通行之说以为“春秋五霸”为“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但从其在《先秦史》对以往“春秋五霸”的探讨可知，如不局限“春秋五霸”一词，吕思勉实更认同“春秋”无“五霸”。

⑦ 姚秀彦《五霸考述》，载《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74年第6期。此后，姚秀彦即出《先秦史》（里仁书局，1980年），其中第四章标题为“春秋时代”。而值得注意的是，此章处处使用“春秋五霸”一词，但未加以说明，只能从字里行间猜测，虽然想当然耳，当是沿袭前文之观点，但有趣的地方正是在此，因为文章多了些模糊其观点之文字，如“五霸的前一霸”、“晋霸权再起”。所以不知沿袭的是“霸不必五”还是“春秋五霸”。

⑧ 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第八上》，其注曰：“此五伯谓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也。”

⑨ 引自王先谦《汉书补注》，艺文印书馆1996年版，卷十四《诸侯王表第二》王先谦引齐召南注。

⑩ 虽然以“吴夫差”配“齐桓、宋襄、晋文、秦穆”为“春秋五霸”无前例可循，但以吴王夫差为“霸”之说并非始于颜师古。《公羊传》哀公十三年载：“吴何以称子？吴主会也。吴主会则曷为先言晋侯？不与夷狄之主中国也。其言及吴子何？会两伯之辞也。不与夷狄之主中国，则曷为以会两伯之辞言之？重吴也。曷为重吴？吴在是则天下诸侯莫敢不至也。”《史记·吴太伯世家》夫差十四年春云：“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

⑪ 黄仲元《四知讲稿》（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版，卷六“五伯”条。

伯迭兴’,师古曰:‘此五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今以春秋始末考之,合以夫差与桓、文、穆、庄为五。”

(七)以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为春秋五霸

此说最为特殊,出于全祖望的《鮑埼亭集外编·春秋五霸失实论》:“春秋之五霸,其说不一。或曰: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也;或则进吴阖闾而退宋襄;或又登越句践而去秦穆。愚皆不以为然。……然则五霸之目,究以谁当之?曰:齐一而晋四也。……文也,襄也,景也,悼也,接齐桓而五也。”^①

全祖望所认定霸者之标准,乃“必能使天下望国皆来听命,定其朝聘之节,张其征讨之威,号令分明,有如葵丘,如践土,而后不媿于礼乐征伐之自出。”由此观之,全祖望重视的乃“大”的“会盟”,因此对以往认定秦穆、宋襄、楚庄、吴阖闾以及越句践可为“霸者”的看法皆有异议,以为此五人或许皆有“主盟”过,“然从之者寥寥,詎能夸纠合之盛乎?”^②

(八)以齐桓、晋文、楚庄、晋悼、吴夫差为春秋五霸

黎东方《先秦史》第十二章“晋国的长期争霸(上)”,曾有以下之论点:“五霸之中不成问题的仅有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三人。倘若宋襄公与秦穆公开除,只有把晋悼公与吴王夫差算进去了。”^[44]宋襄受制于楚庄,最后还被楚庄败于泓,实“不够一个霸主之资格”^[44]。而秦穆既不能与齐桓、晋文一较高下,且被晋襄败于殽,明显看出“力量不够”^[6]。虽然黎东方并未说明选择晋悼与吴夫差之原因,但从其开除宋襄与秦穆之理由来论断,当是以实力为主要的考虑。

(九)以齐桓、晋文、楚庄、吴夫差、越句践为春秋五霸

马毓良于《春秋“五霸”辨》中提出此说^[6],然或许可能因找不出古人之立说来佐证其意见,故马毓良论“春秋五霸”中的吴国时,将夫差与阖闾一起谈论。当然,马毓良的这种“五霸”组合,类似于前述《荀子》的观点。4年后,程刚出版《也谈“春秋五霸”正名》声援之^[6]。不过,程刚当初撰写此文之目的乃在商榷张有智于《“春秋五霸”正名》提出以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为春秋五霸的看法。虽然程刚对于张有智以史实的角度认为齐桓、晋文、楚庄、越句践4人可列为春秋五霸并无意见,但以为

张有智如果在意史实本身的话,所谓的吴王当是指夫差,并非一定要遵循古训而认定为阖闾不可。

而近几年,钟继彬与尤德艳亦分别发表了《春秋五霸与吴王夫差》^②与《“五霸”考释》^③二文来认同此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尤德艳的看法,其以为五霸的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尤德艳认为站在春秋时期论五霸,则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说为宜;但如是处于战国以后之朝代,则还是以齐桓、晋文、楚庄、吴夫差、越句践这一组较为恰当。

(十)以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

1994年孙景坛曾发表名为《“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的文章^[14],探讨前人论春秋五霸之得失,并且一一核对众说之霸者。文章强调五霸一词最早出现于《左传》鲁成公二年的传文,而非《孟子》,因此“五霸”之人选不能晚于鲁成公二年^④,当然《荀子》、《墨子》之说也就不能成立;又以为春秋五霸之所以成为千古悬案,在于过往诸贤所论的五霸组合无一合适,因为只有齐桓、晋文、晋襄、秦穆、楚庄才是春秋五霸之确解,也唯有这5人才能通通符合霸者的条件:“查《左传》可知,时人明确以霸相许的共四人:齐桓、晋文、晋襄、秦穆。如:庄十五年说齐桓,‘始霸也’;僖二十七年说晋文,‘取威定霸’、‘一战而霸’;昭三年追述晋襄,‘昔文、襄之霸也’;文三年说秦穆,‘遂霸西戎’,可见这四人都应属五霸之列无疑。另一人是谁?就是楚庄。关于楚庄的霸如何解释呢?虽然《左传》对此未有明载,但事实上是用旁证来回答的。楚庄成就霸业的标志是晋、楚的邲之战”^[14]。

(十一)以齐、晋、秦、楚、郑为春秋五霸

如说是特立独行,翦伯赞当之无愧。其在《先

① 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编》(收于朱铸禹汇校集注的《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卷三十六《论一·春秋五霸失实论》。

② 有趣的是,从这篇篇名看不出钟继彬之意,反而会让人产生吴王夫差为第六霸的错觉。除此之外,钟继彬对于“伯”的认知非常狭义,只有“公侯伯子男”的“伯”与其假借的“霸”,殊不知尚有“侯伯”与“方伯”之意。

③ 在该文中,尤德艳尚有另一论点,即认为无“三代五霸”,以为“五霸”是春秋时王室衰微、诸侯力政的产物,故只有“春秋五霸”。此论点事实上忽视“五伯”假借为“五霸”之历史,而一意孤行地将所有的“五伯”假借为“五霸”所产生的结果。也就是说,忽略了“五伯”之原意(或多元意),盖前贤所讨论的乃“三代五伯”而非“三代五霸”,纵使后世将常以“三代五霸”一词论“三代五伯”,但所讨论内容的依旧还是“三代五伯”。

④ 事实上,《左传》鲁成公二年的传文为“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明显地将“伯”与“霸”区分,故在此实在不能以后世“伯”、“霸”通假的概念取代之。此外,钟继彬亦于《春秋五霸与吴王夫差》中反驳以鲁成公二年为“春秋五霸”下限的说法。

秦史》中以为春秋五霸并非一定要表示5个人,可以是5个国家,因此翦伯赞改以“五霸继起”一词贯穿春秋时期之历史:“所谓周初八百国,到春秋中叶以后,就只存几十个国家了。而在这几十个仅存的国家中,又以齐、晋、秦、楚、郑最为强大,它们相继勃兴,成为春秋时代的支配力量。……即因这几个大国突出发展,天下大局,遂归结为‘五霸继起’”^[45]。

二、春秋实非五霸

历来讨论春秋五霸,除上所举诸家因过分相信春秋确有五霸从而选筛外,事实上大多数的前辈在研究春秋五霸之后,都会认为春秋实非五霸。当然,春秋究竟有几霸,也就因人认定不同而有所差异^[46]。

(一) 霸无定限

所谓“霸”,就结果而论,杜预的“诸侯长”可说是最好的诠释^[47],而如果以行动表示,则不得不推崇孔颖达“霸者,把也,把持王政”之见解^[47]。因此就《左传》而言,“霸”只有强国才有能力为之,毕竟要先“强”才能“把”。换言之,只要是强国皆可为“霸”,所以《左传》的“霸”并“无定限”。故孔颖达曰:“天子既衰,诸侯无主,若有强者,即营霸业,其数无定限也。”^[47]

虽然“霸无定限”为《左传》注疏家所承认,但事实上《左传》中的“强国”并非真的不可数,所争霸的依旧为齐、晋、宋、秦、楚、吴、越等,故清朝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可说是对“霸无定限”之看法做了“实指”上的修正,其在《左传纪事本末凡例》中的第二条记载:“一主王室,尊周也。次鲁,重宗国,《春秋》之所托也。次齐、晋,崇霸统也。次宋、卫、郑三国,皆为与国,其事多,且《春秋》中之枢纽也。次楚,次吴、越,其国大,其事繁,后之者,黜其僭也。次秦,志其代周,且恶之也。陈、蔡、曹、许诸小国,散见于诸大国之中,微而略之也。晋、楚之争霸,俱详晋事中,晋为主,楚为客也。”^[48]

此外,民初的卫聚贤于《五霸考》亦认为春秋五霸无非是个集团名词^[49]。因此其将《左传》中有记载到征讨诸国并主盟会的君主皆计入,而得出“十九霸”的结论^[49]^①。

总之,不管是孔颖达所言的“霸无定限”,或者高士奇的“争霸”论调,还是卫聚贤举出的“十九霸”,这种以“强”为“霸主”的论点,普遍由以书写春秋历史的学者所接受,从而避免历来“春秋五霸”的

争论。而比较显著的例子有:童书业的《春秋史》^[50]与《春秋左传研究》^[51]^②,应永深、王贵民、杨升南的《春秋史话》^[52],顾德融、朱顺龙的《春秋史》^[46]以及徐远炫的《春秋争霸》^[53]。

(二) 无霸论

诚然后世学者常将“霸”与“伯”通假互用,但对于严守字辞本义的专家来说,这是不能够接受的。因为“霸”乃强权之表征,而“伯”为王命之所任,所以“五伯”与“五霸”是不能等同而书之的,也因为如此,在此类前贤的认知中,五伯所联系的是“三代”。至于五霸,乃后人所赋予之概念,而其目的无非是要使春秋处于乱象,当然所联系的即春秋。总之,对于严守本义之人来说,春秋时期本来就无霸者,何来五霸。

此说之论点或许过于主观,且可能违背历史事实,但传统经典并非无人提及,只是时人皆以论五霸为正途,从而无法彰显。而明显的例子当以墨守谷梁家法的经学家为最。谷梁注疏家就认为“伯”是由天子所授命,如杨士勋所言:“未得王命未可以为伯。”^[43]因此即便齐桓公为“伯”乃诸侯所共推,但最后仍是由天子所授命^③。而既为天子所授命,行事必以天子为主,像鲁僖公二十八年冬《穀梁传》载:“此入而执,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于卫也。”^[43]范宁即曰:“伯者以王命讨卫。”^[43]换言之,“伯”在《穀梁传》中与诸侯同受天子所约束,既为天子所约束,故钟文烝认为《谷梁传》的“伯”是指《周礼》言“九命作伯”的“侯伯”^④。也因此齐桓公为“伯”后,《穀梁传》仍曰“桓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以强调之^[43]。

于是,《穀梁传》于鲁隐公八年所言“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43]的“二伯”,并不能随便替换成“二霸”。又因“二伯”乃是相对于“五帝”、“三王”此二词而来,因此所谓的“二伯”,也就是“三代”之“五伯”,故为齐桓公与晋文

① “十九霸”分别为:齐桓、晋文、晋襄、晋灵、晋成、晋景、晋厉、晋悼、晋平、晋顷、晋定、秦穆、宋襄、楚庄、楚康、楚灵、吴阖闾、吴夫差、越句践。

② 其中,《春秋史》乃据开明书店1964年版重印,而《春秋左传研究》则为其遗作。

③ 《谷梁传》鲁庄公十三年载:“桓非受命之伯也,将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举人众之辞也。”对此范宁即注曰:“言诸侯将权时,推齐侯使行伯事”、“称人,言非王命,众授之以事。”见范宁注,杨士勋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卷五《庄公十有三年》。

④ 钟文烝即言:“案,《王制》八州八伯谓之方伯,此《曲礼》所谓牧,《左传》所谓侯牧,《周礼》‘八命作牧’是也。又有二伯,分天下为左右,此《曲礼》、《左传》所谓伯,《左传》又称侯伯、王官伯,《周礼》‘九命作伯’是也。”见钟文烝,《春秋穀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版),卷六,《庄公十有三年》。

公。为此,杨士勋甚至以“经典”“皆谓”疏之:“经典言五伯者,皆谓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今此传以周末言之,故知谓齐桓、晋文也。”^[43]

(三)以齐桓、晋文为“二霸”

杨士勋“经典言五伯者”中所谓的经典,今尚可见其疏的有《白虎通·号》:“五霸者,何谓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兴复中国,攘除夷狄,故谓之霸。昔昆吾氏霸于夏者也;大彭、豕韦霸于殷者也;齐桓、晋文霸于周者也。”

此外,高诱注《吕氏春秋·先己》“五伯先事而后兵”^①,以及《左传》成公二年“五伯之霸”的杜预注^[47]、成公十八年“所以复霸也”的孔颖达疏^②,与《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适戍强于五伯”的颜师古注^③等亦都有提及。其中,高诱与颜师古又都曾提出对春秋五霸的解释,可知“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对其而言当属不同脉络体系;又孔颖达、杨士勋与颜师古皆为唐初之学者,可知至少于唐初“三代五伯”之说尚流行。只不过这类前贤不像谷梁注疏家那样的严守家法,认为春秋无“霸”唯“伯”尔。此点从“三代五伯”时常被书写成“三代五霸”可知。也就是说,齐桓、晋文是可以成为“二霸”的,并非只局限于“二伯”。然而有趣的是,此类诸贤却不会因为“二霸”之说从而否定其对“春秋五霸”的理解。

相反,相对于谷梁注疏家认为只有“二伯”,宋代的《春秋》学者反而崇信“二霸”^④。如宋朝赵鹏飞于《春秋经筌》所论证:“《孟子》之所谓五霸者,其实威、文而已。宋襄之败,为中国羞,故所不录。而秦穆、楚庄皆蛮戎之长,何名为霸?圣人岂许其霸中国哉?故秦穆、楚庄皆无予辞,非私齐、晋,而鄙秦、楚也。”^⑤

赵鹏飞除了对让“中国”蒙羞的宋襄公不认同之外,更对“夷狄”身份的秦穆公、楚庄王大加贬斥;也因其“大中国”的心态,故对吴阖闾、越句践亦采否定之态度。其言道:“秦穆、楚庄、阖闾、句践皆为中国患,圣人何忍长其寇哉?若阖闾、句践皆逞兵以斗,其私尤无足称据者,《春秋》盖狄之,君子不道也。”^⑥

除了赵鹏飞,宋人家铉翁更于《春秋集传详说》的《纲领》中,特立“明霸”一条来论述“二霸”,以为齐桓、晋文会与宋襄、秦穆、楚庄合称“春秋五霸”乃“后儒为传义所惑”^⑦,且“夫子论齐桓、晋文之涌正,

未尝及秦、宋、楚。”^⑧因此《春秋》只有“二霸”,当然春秋时期也就只有齐桓、晋文两位“霸者”。

稍晚的黄震^⑨,以及元代的赵汭^⑩、明代的杨慎^⑪、钟忻^⑫,无不受“二霸”论的影响。事实上,这还只是冰山一角,相信从宋朝以降深信“二霸”的学者当不止如此。至于民国以来,认为春秋只有齐桓、晋文“二霸”的,亦不乏其人,著名的有梁启超的《春秋载记》^⑬、钱穆的《国史大纲》^⑭,以及马先醒的《春秋五霸与秦穆五贤》^[51]^⑮。

① 陈奇猷校注《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三《季春纪第三·先己》,高诱注。

② 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注疏》,卷二十八,《成公十八年》。疏曰:“夏有昆吾,商有豕韦、大彭,周有齐桓、晋文,此最强者也,故书传通谓彼五人为五霸耳。”

③ 班固《汉书》卷十三《异姓诸侯王表第一》,颜师古注。注曰:“五霸谓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也。”

④ 笔者在此须特别说明,“二霸”之说并非起于宋朝,且并非所有宋代的《春秋》学者皆谈“二霸”,只是在笔者所见资料中,宋代的《春秋》经学家比较注重“二霸”,故于此如此书写。且正文之所以首提赵鹏飞,次论家铉翁,后举黄震、赵汭、杨慎、钟忻等人,无非是笔者在所搜集到资料中,这几人有明显的谈论到“五霸”,且看法相似,故强调之。

⑤ 赵鹏飞《春秋经筌》(收于《通志堂经解》,台北:大通书局,1972年9月)卷八《文公三年》“秦人伐晋”条。引文中“桓公”书写成“威公”,乃南宋的避讳字。《宋史》,卷一〇八,《礼志·庙讳》载:绍兴二年十一月,礼部、太常寺言:“渊至皇帝御名,见于经传义训者,或以威武为义,或以回旋为义,又为植立之象,又为亭部表名,又为主名,又为姓氏,又为木名,当各以其义类求之。以威武为义者,今欲读曰‘威’;以回旋为义者,今欲读曰‘旋’;以植立为义者,今欲读曰‘植’;若姓氏之类,欲去‘木’为‘巨’。……”

⑥ 赵鹏飞《春秋经筌》卷九《文公十八年》“甲戌楚子旅卒”条。

⑦ 家铉翁《春秋集传详说》(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8册)。

⑧ 黄震《黄氏日抄》(台北:大化书局,1984年12月)卷九《读春秋三》,“冬十有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卒”条。黄震如此载:“霸之为言,王室既衰,方伯出而攘夷狄,以安中国,齐威、晋文是也。宋襄狂愚,戕中国而结夷狄,霸之反也。秦穆、楚庄以夷狄而胁中国,霸之变也。皆不可言霸也。”此外,对于黄震的“二霸”说,林政华曾发表过一篇《黄震的春秋二霸说》,刊于《孔孟月刊》第13卷第10期(1975年6月),不过在该文中,林政华认为“二霸”说乃黄震独到的见解,此说应是有待再商榷的余地。

⑨ 赵汭《春秋属辞》(收于《通志堂经解》)卷十二《谨华夷之辩第五》“中国无伯则楚君将称君略之而后称人疑于讨贼称师”条,以及《春秋金锁匙》、《春秋集传》等。

⑩ 杨慎《升庵集》(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0册)卷五“二伯论”条。虽然杨慎题为“二伯”,但从其文意可知其“伯”与“霸”通假。

⑪ 钟忻曾对《风俗通义》下工夫做评比,因此对于《风俗通义》的“五伯”也有所意见。详见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卷一《皇霸·五伯》“谨案”的部分。今所见《风俗通义》“谨案”之语皆来自于钟忻,常有学者不察,以为是为应劭之意旨。当然,于此也就认为应劭采“二霸”说,例如陈立就有“案五伯定论,应如劭说”的误解。

⑫ 梁启超《春秋载记》(收于氏著《国史研究六篇》(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年版)。其在《纪齐桓晋文霸业章》即言:“五霸之名,始于春秋,章于战国,旧说所指不一,然以吴所言霸政之界说,为齐、晋足以当之耳。”

⑬ 钱穆《国史大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钱穆认为成为“霸者”的条件有四:尊王、攘夷、禁抑篡弑、裁制兼并,而此能做到此四者的,钱穆认定只有齐桓、晋文。

⑭ 马先醒认为“论时代,吴、越不当称为霸者;论文化,秦、楚不当称为霸者;论实力,宋襄公又不足以称霸者。故真正的霸者,唯齐桓、晋文。”如果再加上孔子“齐桓正而不谄,晋文谄而不正”此一条件的话,马先醒更以为“齐桓公乃唯一之标准霸主。”

(四) 以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灵、晋成、晋景、晋厉、晋悼、晋平、晋昭、晋顷、晋定为十三伯

南宋的李琪在处理《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中的“霸世纪”时,就采8个小节,列举了“齐桓、宋襄、晋文、晋襄、晋灵、晋成、晋景、晋厉、晋悼、晋平、晋昭、晋顷、晋定”十三位“霸者”^①。而考察其“作意”,除了延续诸夏夷狄之别来区分“霸者”,更重要的是以齐、宋、晋“十三伯”来配东周“十四王”以编《春秋》世纪,其说如下:“琪少窃妄意,叙东周时有四王之统,合齐、宋、晋十有三伯之目,举诸侯数十大国之系,皆世为之纪,不失全经之文,略备各代之实。……”^②

李琪的说法,得到元人俞皋的继承,其在《春秋集传释义大成》的《春秋世次图说》中就有“十三伯”一节^③。且俞皋补充了李琪论说之不足,充分说明了晋国诸公可以称霸之理由:“《春秋》之拳拳与晋者,实忧天下之切也。至于灵、成、景、厉之世,晋伯稍衰,而盟会必先序晋者,岂非与之伯乎?……至于平、昭、顷、定,愈降愈坏,列国之不若也。然终乎黄池之会,《春秋》犹以伯与晋,则晋虽不能伯,而《春秋》犹未绝晋也。”

(五) “五”字为虚数

另外尚有一种解释,亦算是“霸无定限”之一,即认为“春秋五霸”的“五”字是一个虚数,本无固定数字可言。如王树民于《释“四王”与“五伯”》一文中就强调“五伯”实为“五侯之伯”之义,既不可拘限于实数,更不可特定为某几个人。又如黄耀崇的硕士论文《左传霸者的研究》,以为“春秋五霸”一词的出现与战国末期盛行的五行思想有关,因此认为“五霸”的“五”字,本是一个虚数,是后人把它用实了^[54]^④。此外,赵东玉的《五霸别解》是从金文和文化的角度说明“五”字是虚数:首先,金文中的“五”字是个很容易传达纵横交错繁杂之义的文字;其次,中外的文献皆可证明早期的人们是有喜欢把“五”字当作虚数的习惯。因此赵东玉强调“五霸”应是虚指,而这一组辞句正可表现春秋时期诸侯纷争、霸主迭兴之象,因此不必困惑于文献中人言人殊的“五霸”组合^[18]。

(六) 以齐桓、晋文、晋悼、楚灵为“四霸”

此见解见于陈筱芳《“春秋五霸”质疑与四霸之成功》。她认为以往学者认定“霸主”的条件有3

个:第一,合会中原诸侯,被推举为盟主;第二,获得周天子赐为侯伯之命;第三,诸侯往朝,并向他献纳贡赋。符合此三者并在《左传》有记载的只有齐桓与晋文。事实上,第二点和第三点并非绝对需要的条件,因此其以为“春秋”有“四霸”,除了齐桓、晋文外,尚有晋悼与楚灵。其论说如下:“自晋文公开创晋的霸业,其子孙经常主盟诸侯,或与楚共霸,其中最著名者乃悼公。晋悼公于鲁成公十八年至襄公十五年在位,十六年间,举行盛大的诸侯会盟十六次,与会者多至十国以上达七次。声势轰轰烈烈,超过晋文。此外,……使晋畏惧而独霸天下的楚君是灵王。楚灵王于昭公二年至昭公十三年在位,十二年中四合诸侯,其中申之会多达十三国。……传统所谓‘春秋五霸’多与史实相悖,若以国为代表,则可称‘春秋三霸’——即齐桓、晋文、楚灵;若论社会影响力,则可称‘春秋四霸’——即齐桓、晋文、晋悼及楚灵,四人霸业辉煌,对当时社会政治影响犹大。”^[13]

此说虽然由陈筱芳提出,但对于晋悼公、楚灵王称霸的观念,前贤其实已有论述,如孔颖达就引何休疏言:“不许悼公为霸,以乡曲之学足以忿人。”^[47]此外,杜预亦注曰:“楚子(灵王)欲行霸,为齐讨庆封。”^①

不过,如果仔细分析陈筱芳这段引文,可发现陈筱芳所认同的应不只这4人,尚包括晋文公、楚庄王之子孙。陈筱芳又发表了《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全然以“霸主”的角度论之^[55]。其在两篇文章中处处以《左传》为例,因此不免让人联想到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

三、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成为通说的原因

从前面的论述中,可发现诸位学者所争论的乃

① 此8个小节分别是“霸世纪齐桓公”、“霸世纪宋襄公”、“霸世纪晋文公”、“霸世纪晋襄公”、“霸世纪晋灵成景厉”、“伯世纪晋悼公”、“伯世纪晋平昭”、“伯世纪晋顷定”。至于“霸世纪”与“伯世纪”有无不同,从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的内容、字句来看,李琪当是将“霸”与“伯”通假。详见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收于《通志堂经解》),卷第一。

② 李琪《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

③ 俞皋《春秋集传释义大成》(收于《通志堂经解》)。

④ 事实上,黄耀崇在其硕士论文中,还是以实数看待“春秋五霸”,认为《左传》提到的“霸者”共计19人,分别为齐桓、晋文、晋襄、晋灵、晋成、晋景、晋厉、晋悼、晋平、晋昭、晋顷、晋定、秦穆、宋襄、楚庄、吴阖闾、吴夫差、越句践、郑庄。

在实力、尊王以及夷狄之别上；所辩论的无非是“霸”还是“伯”，三代的还是春秋的，以及是经学的、诸子的，还是历史的等。然而问题亦在此，即两千年来不断地有人对“春秋五霸”提出异议，为何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一春秋五霸之组合，会一直成为通说，甚至影响到国内今日的教育体系。

不过时从表 1 可发现，如果以“春秋五霸”来论，东汉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这一组组合出现后，以“五”为组合的论说，确实至清末无人能提出较好的说法。纵使有人提出异议，亦无影响。

表 1 战国至民初学者对“春秋五霸”的界定

年代	春秋五霸
战国	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
秦朝	齐桓、晋文、秦穆、楚庄、越句践
西汉	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阖闾
东汉	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
魏晋	无霸
南北朝	
隋朝	
唐朝	齐桓、宋襄、晋文、秦穆、吴夫差；亦有人主张霸无定限
五代	
北宋	齐桓、晋文
南宋	齐桓、晋文、秦穆、楚庄、吴夫差；亦有人主张十三伯
元朝	
明朝	
清朝	齐桓、晋文、晋襄、晋景、晋悼
民初	

但此马上产生另一问题，即《白虎通》之说虽然晚至东汉时期才出，可是并不表示一定会是“正解”。再说，《白虎通》本身亦存在着“异解”。也就是说，《荀子》等旧说依然可通行于世，那为何后世学者会放弃《荀子》之说？诚然，近代学者多将此问题归结于《荀子》等旧说乃战国时的通论，因而无法对应两汉的新变局。然而，此种答案事实上仍未触碰到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根本乃在于为何《白虎通》之说出现后，人们纷纷弃旧说而不用。于是，《白虎通》与东汉学术成了关键。

《白虎通》乃班固奉东汉章帝之诏所编，其内容为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和诸生在白虎观讨论五经同异的会议结果，更重要的是章帝亲临现场，裁定对错，决定取舍。因此，《白虎通》的出现难免使东汉的学术带有国教的色彩。诚然如此，《白虎通·号》对于“五霸”的解释依然有三说，分别为：“昆吾氏、

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也就因为这三说的并存，故不知哪一说可代表《白虎通》的正解，更无庸说哪一说才是国教所亲睐的答案。但值得注意的地方亦在此，盖此三说分别可在《谷梁》、《公羊》二传与其它经典上找到支持的论点，而《谷梁》、《公羊》的争论从西汉以来就一直处于针锋相对的态度，故此或许是依存三说的原因。当然，《白虎通》所呈现出的状态无非是说明东汉初期学术的不稳定。不过，如果再从赵岐、高诱、杜预等汉、魏学者的引用来分析，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吴王阖闾此一五霸组合并不被当代学者所采纳与继承，反倒是昆吾氏、大彭氏、豕韦氏、齐桓公、晋文公与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这两说，除汉、魏学者奉信外，到了隋、唐均还见其影响力。而更有趣的是，上述二说正为历来前贤所常争论的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

是故，当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成了争论的焦点时，“五伯 / 五霸”究竟所指为何已非重点所在，反而“承传”才是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大部分的学者并不会试图创立新的春秋五霸组合，而是就眼前的三代五伯与春秋五霸进行争论。又由于春秋五霸中的齐桓公、晋文公时时有《论语》的背书，故前贤多将争论的焦点放在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三人。以宋襄公为例，历来对宋襄公，特别是对他在泓之战中的表现就有两种意见，一种讥其迂腐，如《左传》；一派赞其有德，如《公羊传》。然而由于《左传》争立学官较晚，故对宋襄公泓之战的评价，汉初以来多趋向《公羊传》之观点，董仲舒即说：“霸王之道，皆本于仁……故善宋襄公不厄人。不由其道而胜，不如其道而败。《春秋》贵之，将以变习俗而成王化也。”^[56]

这里说的《春秋》当是指《公羊传》。因此《白虎通》推尊宋襄公为春秋五霸之一，乃是只问礼义不问成败地确定宋襄公的“霸者”形象。至于，后世多以《左传》记载之史实，以为宋襄公“不知战”从而让“中国”蒙羞，否认宋襄公的“霸者”形象，则过于以功利来论断宋襄公，而这在一切多以“礼义”为导向的中国，“功利”的宋襄公自然敌不过含有圣人之意的宋襄公^①。

① 民国以来的史学研究，常希望从客观的角度追寻宋襄公“义战”的原因。而得出的结论多是认为，宋襄公并非伪诈，也非真有仁德，他确实就是那么迂阔而不顾现实。这种新见解应可说是经学价值观瓦解以后，此一谋略观点在不知不觉中决定了现今的知识取決、学术论述与教育体系。

至于，秦穆公虽有“千里袭郑”之失，楚庄王亦有“问鼎中原”之过，但因此二人事后均曾自我反省，故圣人亦与之。而最常被称颂的莫过秦穆公的悔过作《秦誓》之举，而这也正是《白虎通》所言：“《尚书》曰：邦知荣怀，亦尚一人之庆。知秦穆之霸也。”当然，在此论述的脉络下，也就无关乎其是否为“夷狄”。而既无“夷狄”之区隔，于是秦穆公东平晋乱，西伐诸戎；楚庄王克陈入郑而不取，反佚晋寇，皆成了正面的论述，《公羊传》甚至对楚庄王有“实与而文不与”的书写^[42]。故而孔子赞许秦穆公、楚庄王的言论也就时常被加以放大引用，如孔子就曾言：“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穀，爵之大夫，起累继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30]又言：“贤哉楚王！轻千乘之国，而重一言之信。匪申叔之信，不能达其义；匪庄王之贤，不能受其训。”^①

总之，此种“圣人与之”的论调，可说是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通说且不败之理由之一。

即便“圣人与之”为多数裁定“春秋五霸”的理由，但是依然有问题，即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此一说法，不仅通过唐代的正义，还经过宋朝的重读，甚至明清的考证后，依旧为通说^②。因此，欲了解此一春秋五霸的组合之所以会成为通说的原因，与其从各家争论哪些诸侯可成霸，而得出众多的歧异见解，不如改从支持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此一看法者的论述中找寻线索，或许可看出端倪。

而论者最常用的理由之一，乃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这一组合的出现，符合圣人论述的时代背景，如清人阎若璩就言：“昆山顾宁人炎武谓五伯有二：有三代之五伯，杜元凯注《左传》成二年者是；有春秋之五伯，赵台卿注《孟子》五霸章是。今集注并列二说而无折衷非是，当止存赵注。盖孟子止就东周后言之，而以桓为盛。如严安所谓周之衰三百余岁，而五伯更起者也。……即董仲舒亦云然矣。仲舒云：‘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皆羞称五伯。’夫惟宋襄辈在仲尼之前，故言羞称，不然，句践也霸，且不出仲尼后哉。”^③从引文可知，春秋五霸之选择必须符合孔、孟立说之时代背景，因此条件有二：第一，五霸生于孔子之前；第二，五霸处于东周时代，亦即春秋时期。

除了时代背景要符合之外，宋代以降论述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之最主要的原因，

乃在于符合“罪人”之形象，如明朝的张萱就言：“霸之有五，春秋传皆谓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而孟子止言齐桓、晋文，不言其三，故有以宋襄何足言霸，秦穆、楚庄本皆夷狄，皆不足称霸，而以夏之昆吾、商之大彭、豕韦，与齐桓、晋文为五者，何燕泉亦从其说。余谓不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昆吾、大彭、豕韦亦皆三王之罪人乎？五霸之名当以春秋为正。”^④

清代的蒋炯亦补充道：“窃以霸古字作伯，所谓侯伯也。侯伯命于天子，得专征伐。而孟子乃以伐诸侯为罪，于此可证此五霸唯据东周以后而言。……春秋之霸，惟齐桓、晋文有王命，《左传》庄公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赐齐侯命，僖公二十八年，策命晋侯为侯伯。然齐未受命之时，已先灭谭、灭遂、伐宋、伐郑；晋未对命之前，已先入曹、伐卫、战楚城濮。至宋襄，王者之后，例不为伯。秦穆、楚庄，僻在戎蛮，并无王命，莫不连兵侵伐以争雄长，此衰周之五霸，搂诸侯以伐诸侯，所以为罪也。”^⑤

也就是说，已有部分论春秋五霸的学者，不全然在乎是哪五霸，“三王之罪人”、“搂诸侯以伐诸侯”才是其讨论春秋五霸的主要重点。于是以往的成见便成通说，甚至定解。换言之，此时论春秋五霸不再是一味地寻求“功绩”，而是贬责多于赞赏。因此，也就不难推测为何两宋以来，不管是“二霸”或是“霸无定限”，皆可与传统的春秋五霸一起承传而不相干涉，盖春秋五霸之内涵已经转移。甚至可以说，春秋五霸一词反而无法贴近宋代以降的《春秋》传说，而尊王攘夷不再是春秋五霸甩不开的包袱。

另一方面，从张萱、阎若璩、蒋炯等人的言论可发现一有趣的情况，即其之所以赞成或论述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皆是以《孟子》的角度出发，当然所论述离不开赵岐注《孟子》的五霸。而此独尊《孟子》的情形，或许与南宋光宗绍熙年间将《孟子》定为十三经之一有关。于是，春秋五霸成为学子皆需背诵、了解之课题，以应付试题。

① 王肃注《孔子家语》（收于《四部丛刊》，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7册）卷第二《好生第十》。

② 从宋、元、明、清等时代学者反对的言论中，可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为“春秋五霸”之说，仍为主流。

③ 阎若璩《四书释地三续》（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0册）卷下“五伯”条。杨明照于《五霸考》一文中，对于此段文字似乎产生误读，认为阎若璩所说的“春秋五霸”为“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句践”。但有趣的是，半个世纪后，孙景坛于《“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亦同杨明照误读。

④ 张萱《疑耀》（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6册）卷一“五霸”条。

⑤ 蒋炯《五霸考》，收于阮元手订《诂经精舍文集》（收于《中国历代书院志》，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卷三。

“五帝三王功德之盛,后世莫及。春秋五霸功罪相半,殆必有其故欤?汉之七制、唐之三宗,其于五帝三王或庶几乎?愿闻其详。”^①此策题乃明初郑真所搜,而从策题中一句“春秋五霸功罪相半”可知春秋五霸已为普遍知识,更知如对《孟子》一经不熟悉,将不知春秋五霸何“罪”之有。当然,这里对春秋五霸的理解必也出于《孟子》的赵岐注。换言之,春秋五霸一词已成《孟子》之专属,今之学者若欲从《春秋》去论春秋五霸,反而多了隔阂。

由此也就不难想象,为何近代学者每每能够提出不同的春秋五霸,盖吾人所认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五人的组合,皆因圣人而有其特殊的经学意义,或属《春秋》学,或属《孟子》学,当然也就无关史实。因此,凡以他子之书或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当时的春秋五霸,已非传统文化流传下的春秋五霸,而是一人一己之私意。

四、结语

在中国的历史脉络中,春秋五霸历经诸家的释义,产生无数的歧异,最终以齐桓、宋襄、晋文、秦穆、楚庄此五人的说法广为流传,成为吾人不管是认同或否定,皆熟知的组合。究其原因,乃“春秋五霸”一词所涵盖的文化意涵,比起它所涉及到的历史事实,更具教化传承意义。影响至今,春秋五霸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专有名词,依然是文化论述重于实力表述。

参考文献:

- [1] 致中. 求是斋读书志疑:五霸[J]. 燕京大学史学年报, 1929,1(1):8.
- [2] 卫聚贤. 五霸考[J]. 说文月刊,1939,1(1):557-569.
- [3] 杨明照. 学不已斋杂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4] 姚秀彦. 五霸考述[J]. 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1974(6):1-27.
- [5] 马先醒. 春秋五霸与秦穆五贤[J]. 简牍学报,1978(6):151-155.
- [6] 马毓良. 春秋“五霸”辨[J]. 江淮论坛,1982(2):19-21.
- [7] 张有智. “春秋五霸”正名[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1):105-108.
- [8] 程刚. 也谈“春秋五霸”正名[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4):90-92.
- [9] 周国荣,沈容. “五霸”还是“五伯”[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4):93-94.
- [10] 王树民. 释“四王”与“五伯”[J]. 文史,1987(3):297-299.
- [11] 王玉德. “春秋五霸”提法不科学[J]. 史学月刊,1988(3):86-87.
- [12] 刘浦江. “春秋五霸”辨[J]. 齐鲁学刊,1988(5):36-41.
- [13] 陈筱芳. “春秋五霸”质疑与四霸之成功[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5):83-88,92.
- [14] 孙景坛. “五霸”在历史上的确切所指新说[J]. 南京社会科学,1994(4):31-37,57.
- [15] 钟继彬. 春秋五霸与吴王夫差[J]. 文史杂志,1998(5):48-50.
- [16] 谢军鹏. 浅谈“春秋五霸”[J]. 乌鲁木齐成人教育学院学报,1999(4):44-45.
- [17] 赵东玉. 五霸别解[J]. 史学汇刊,2000(2):7-8,16.
- [18] 尤德艳. “五霸”考释[J]. 许昌师专学报,2001(4):75-78.
- [19] 桑东辉. “春秋五霸”与战略格局的嬗变[J]. 军事历史研究,2006(3):113-119.
- [20] 林政华. 黄震的春秋二霸说[J]. 孔孟月刊,1975,13(10):1-3.
- [21] 冯庆余. 郑庄齐桓宋襄的霸政[J]. 松辽学刊:社会科学版,1990(2):40-45.
- [22] 魏昌. 楚成王争霸述论[J]. 荆州师专学报,1990(3):81-88.
- [23] 杨秋海. 魏绛在晋悼公复霸中的地位[J].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2):23-25.
- [24] 陆德明. 经典释文[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2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高雄:高雄复文图书出版社,1998.
- [26] 朱浩毅. 《春秋》三传对“霸/伯”的理解及其诠释问题[J]. 史学汇刊,2005(20):17-40.
- [27] 赵岐. 孟子注疏[M]. 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
- [28] 尸佼. 尸子[M]. 汪继培,辑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2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30] 王先谦. 荀子集解[M]. 沈啸寰,王星贤,校. 北京:中华书局,1997.
- [31] 孙诒让. 墨子闲诂[M]. 孙启治,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1.
- [32] 郑会欣. 春秋五霸[M]. 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3] 晁福林. 乱世称雄:春秋五霸[M]. 台北: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

^① 郑真《荜阳外史集》(收于《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34册)卷六十七《月试策题》。

- [35] 林汉达. 春秋五霸[M]. 北京:中华书局,1963.
- [36] 张景贤. 春秋五霸[M].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7] 张溥. 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M]. 台北:文津出版社,1979.
- [38] 顾炎武. 日知录集释[M]. 黄汝成,集释. 长沙:岳麓书社,1996.
- [39] 马先醒. 春秋五霸与秦穆五贤[J]. 简牍学报,1978(6):151-155.
- [40]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4.
- [41] 应劭. 风俗通义校注[M]. 王利器,校注.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42] 何休,徐彦. 春秋公羊传注疏[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43] 范宁,杨士勋. 春秋穀梁传注疏[M]. 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
- [44] 黎东方. 先秦史[M]. 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1956.
- [45] 翦伯赞. 先秦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46] 顾德融,朱顺龙. 春秋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 [47] 左丘明. 春秋左传注疏[M]. 杜预,注. 孔颖达,疏. 台北:艺文印书馆,1997.
- [48] 高士奇. 左传纪事本末[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49] 卫聚贤. 五霸考[J]. 说文月刊,1939,1(1):565.
- [50] 童书业. 春秋史[M]. 香港:太平书局,1962.
- [51] 童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52] 应永深,王贵民,杨升南. 春秋史话[M].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
- [53] 徐远炫. 春秋争霸[M]. 台北:远流出版社,2002.
- [54] 黄耀崇. 左传霸者的研究[D].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1993.
- [55] 陈筱芳. 论春秋霸主与诸侯的关系[J].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3):1-7.
- [56]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M]. 北京:中华书局,1996.

Textual research and contextu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five overlord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ZHU Hao-yi

(School of Humanities, Foguang University, Yilan 27262, Taiwan,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tradition, Qihuan, Songxiang, Jinwen, Qinmu, and Chuzhuang have always been regarded as the members of “the five overlords”. However, many ancient scholars had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is issue, such as the addition or deletion of Jindao, Chuling, Wu Helv, Fuchai, Yue Goujian, and so on. The discussions of recent scholars are focused on “powerful chief” or “the dean of international”, and “classical” or “historical”. There are different versions of “the five overlords” in Chinese tex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historicity and contextuality of “the five overlords of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at via scholars’ research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Chun Qiu); five overlords; two powerful chiefs; two deans; *Mencius* (*Meng Zi*)